



JICS

Journal of Integrated Cultural Studies

JICS Vol. 1, No. 1, 2026, pp.32-42.

Print ISSN: 3105-840X; Online ISSN: 3105-8418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ICS.26.1.04>



重塑英语世界的苏轼：包腊对东坡的译介和文化定位

姚达兑 (Yao Dadui)

摘要：有学者认为，普鲁士来华传教士郭实腊是最早将苏轼诗文译介至英语世界的人，正是他通过多种策略塑造了苏轼全才且完美的形象。然而这一论断的后半并不符合事实。早在1872年，郭实腊的东坡诗文译介便遭到包腊的严厉批评，后者指出其译文错误频出、缺乏可信度，进而影响了西方世界对苏轼的准确认知。相较而言，包腊译介了多篇苏轼诗文，并为其赋予了全新的文化定位。他不仅将苏轼视为政治人物、诗人和文人，更强调其作为超越政治身份的思想者与文化巨匠的独特价值。包腊展现了苏轼可亲可爱的个性特质，指出其兼具学者的智慧与圣贤的品格，体现出一种更为全面而深刻的文化解读。通过对苏轼及其作品的重新审视，包腊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早期汉学家对苏轼的片面解读，从而推动了英语世界对苏轼译介与研究的客观化与深入化。

关键词：苏轼（苏东坡）；郭实腊；包腊；《中国评论》

作者简介：姚达兑，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电邮：yaodadui@foxmail.com。

Title: Reconstructing Su Shi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E. C. Bowra's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Repositioning of Dongpo

Abstract: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Prussian missionary to China, K. Gützlaff, was the first to introduce Su Shi's poetry and prose to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nd that it was through his various strategies that Su Shi was portrayed as a versatile and flawless figure. However,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assertion does not align with the facts. As early as 1872, Gützlaff's translations of Su Shi's works were severely

criticized by E. C. Bowra, who pointed out numerous errors and questioned their credibility, thereby affecting the accuracy of Su Shi's reception in the West. In contrast, Bowra translated multiple pieces of Su Shi's poetry and prose, offering a fresh cultural redefinition of Su Shi. He regarded Su Shi not only as a political figure, poet, and man of letters but also highlighted his unique value as a thinker and cultural giant beyond his political identity. Bowra revealed Su Shi's endearing and approachable personality, emphasizing his rare combination of scholarly wisdom and sage-like virtues, thus present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rough his re-examination of Su Shi and his works, Bowra partially corrected the early Sinologists' biased interpretations of Su Shi, thereby promoting a more objective and in-depth engagement with Su Shi's translations and studie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Keywords: Su Shi (Su Dongpo);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E. C. Bowra; *The China Review*

Author Biography: Yao Dadui,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Hain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yaodadui@foxmail.com.

一、前言

徐华在其 2023 年 (p.15) 出版的著作《苏轼文学作品的英译与传播》中指出, 普鲁士来华传教士郭实腊 (K. F. A. Gützlaff, 1803-1851) 最早将苏轼的诗文译介至英语世界。她总结道, 郭实腊的译介策略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挖掘苏轼成功的根源” “多角度展示苏轼的完美” “全方面展示苏轼的文学成就”, 而正是通过这些策略, 郭实腊成功塑造了苏轼“全才”的形象, 为读者呈现一个全面立体的苏轼 (徐华, 2023, pp.226-232)。这种评价, 与晚清外交官-汉学家包腊 (E. C. Bowra, 1841-1874) 对郭实腊的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 尤其是“成功”“完美”“全方面”等关键词, 并不符合事实 (姚达兑, 2025, pp.68-77)。

早在 1872 年, 包腊在《中国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对郭实腊的译介活动提出了严厉批评 (Bowra, 1872, pp.32-37)。他指出, 虽然刊载于《中国丛报》的四篇关于苏东坡的文章是英语世界最早的东坡相关资料, 但这些文章内容错误百出, 几乎无法帮助读者了解苏东坡的真实生平。他特别提到, 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从那种毫不关乎事实和轻率粗俗的风格, 便不难判断应是出自郭实腊先生那支“不可信任之笔” (Bowra, 1872, p.32)。包腊的评价包含了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 (1) 他强调, 在自己撰文之前, 英语世界仅有的四篇东坡相关文章均出自《中国丛报》, 但这些文章缺乏准确性, 令人难以信服。(2) 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笔者推测包腊所指的可能是郭实腊为《苏东坡全集》撰写的那篇长书评。(3) 包腊批评郭实腊的文章“毫不关乎事实”“轻率粗俗的风格”, 并认为其写作一如既往地不可信任。这几乎是全面的否定。

包腊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郭实腊的几篇文章确实反映了早期英语世界中苏轼译介的混乱局面，并对苏东坡诗文及其形象的传播造成了较多负面影响。正是在包腊的文章发表后，英语世界的苏轼研究与评介才逐渐趋于客观和深入。徐华在《苏轼文学作品的英译与传播》中提及了包腊的译文情况，但未对其译作进行深入分析，也未详细探讨包腊对苏轼的历史定位问题（徐华，2023，pp.289-291）。因此，本文将在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探讨，以更清晰地揭示早期苏轼英语译介的复杂性。

二、包腊译介苏轼三篇谢表

包腊的文章“源自一本未出版的《广东通志》”，但作者未明确说明这部《广东通志》的来源（Bowra, 1872, p.32），故而不能确定他这篇文章是取材于哪一部《广东通志》的原稿，是源自英文稿件，抑或翻译自中文稿件。根据文章的行文风格来看，似乎是基于某部已有的手稿而撰写，并非从中文翻译为英文。包腊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任何一部提及北宋时期广东历史的著作，若不涉及苏东坡，就会显得很不完整”（Bowra, 1872, p.32）。这一论述进一步强调了苏东坡在广东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他在惠州和儋州期间对当地文化的深远影响。这种评价反映了包腊对苏东坡历史地位的高度认可。

包腊《苏东坡》一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介绍苏轼的生平，特别是他被贬岭南的经历；二是译介苏轼的几首诗作。他的文章通过对三篇谢表的叙述串联起苏轼在惠州、儋州、廉州三地的经历，同时对苏轼的文学创作进行解读。

(1) 关于三篇谢表的翻译与分析。苏轼被贬岭南，途经广东惠州、海南儋州，再获赦过海，到达广西廉州（今属北海市）。在惠州、儋州和廉州三地，他分别撰写了《到惠州谢表》《到昌化军谢表》和《移廉州谢上表》。谢表是臣下向君主表达感恩的奏章，形式上充满敬意且规范化，而包腊对这些谢表的翻译并未逐字对应，而是提取其核心思想，用更为流畅的文字重写，并穿插在对苏轼生平的叙述中。首先是《到惠州谢表》的翻译。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因被指控“污诋圣教”及“前掌制命，语涉讥讪”等罪名，被贬至英州。在贬谪途中，他的罪名进一步加重，被改贬至更为偏远的广东惠州。苏轼《到惠州谢表》原文提到：“仁圣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群言交击，必将致之死亡。尚荷宽恩，止投荒服。”（曾枣庄、舒大刚，2021，p.1362）包腊将其译为（笔者返译）：“我完全沉浸在陛下的怜悯之中，衷心感谢您赐予我这个职位。在所有声音都在迫切要求处死我之时，您依然对我施以恩宠和怜悯，将我安置在这片荒凉之地。”（Bowra, 1872, p.33）包腊的译文用直白且情感浓烈的语言传达了苏轼的感恩之情和处境艰难的现实。原文中的比喻也在译文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比如原文“虺颓之马，犹获盖帷；齧棘之牛，得违刀几”。（曾枣庄、舒大刚，2021，p.1362）此句被译为：“就如同人们会为最虚弱疲惫的马披上毯子，或怜悯那只颤抖着等待屠刀的老牛。”（Bowra, 1872, p.33）这样的表达不仅传递了原文的隐喻，还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情感冲击力。

其次是《到昌化军谢表》的翻译。《到昌化军谢表》与《到惠州谢表》在内容上具有相继性，有部分表达很相似，但情感更为深沉，即苏轼的哀伤更甚。《到惠州谢表》的末句“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曾枣庄、舒大刚，2021，p.1362）在

《到昌化军谢表》中也有相似的表达，“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曾枣庄、舒大刚，2021，p.1362）两份谢表的最后结尾是相似的，但是绝望更深了一层。因为在渡海至海南之时，他已经与痛哭的子孙以逝世的方式告别。这几句在包腊译文中变成，“而我已经年事已高、独行无友、孑然一身，被种种非议和疾病困扰。我告别了我的儿孙，留下他们在我分别的岸边痛哭，心碎欲绝，悲痛至极，仿佛心已死去。我在这里迎接我的，只有地精和凄惨的生物。面对这一切，又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活着回来呢？”（Bowra, 1872, p.34）苏轼《到昌化军谢表》原文提到：“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馀责。”（曾枣庄、舒大刚，2021，p.1362）包腊的英译文笔者返译为：“我曾向东行至魔鬼的门口，又向南来到这片瘟疫之海。我已注定无法活着返回，即便是死亡也不足以弥补我的罪过。”（Bowra, 1872, p.34）包腊的翻译对原文的意境把握较好，尤其是对“鬼门”“瘴海”等意象的还原。此外，原文中提到的“瘴疠之地，魑魅为邻”在译文中变成：“我迎接我的，只有地精和凄惨的生物。”译文虽与原文有一定的偏离，但在文化移植的层面上，译文通过添加想象性的描述增强了读者的代入感。

最后是《移廉州谢上表》的翻译。苏轼的原文是这样的，“风波万里，叹衰病以何堪；烟瘴五年，赖喘息之犹在。怜之者谓之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轻。考图经止曰海隅，其风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无御冬。凄凉百端，颠蹶万状。恍若醉梦，已无意于生还……”（曾枣庄、舒大刚，2021，p.1370）笔者对包腊英译文的返译如下：“我身体虚弱，健康状况不佳，几乎无法承受五年瘴气的折磨，幸好我还活着。可怜我的人说我受了很多苦，恨我的人却说我受到的惩罚很轻。让这些人去参考一下当地的地理情况吧，这个被称为‘海角之遥’的地方。事实上，这里的风俗礼仪并不适合人类。两天时间里，你连足够的食物都无法得到一份。也没有衣物御寒保暖。你会遭受百般痛苦，踩入无数通向死亡的道路。我的喜悦如同一场梦，因为我从未想过能够活着回来。”（Bowra, 1872, p.35）

此处译文生动再现了岭南环境之恶劣，尤其“海隅”“风土疑非人世”的翻译，直白且形象地表达了苏轼的绝望与苦难。包腊的三篇谢表译文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局限性。分析包腊译文可以看出，其在帮助英语读者理解苏轼岭南经历方面做出了贡献。他的译文在措辞与文体上展现出流畅性与文学性，能够有效传达苏轼谢表的核心内容和情感。此外，包腊批评郭实腊存在“毫不关乎事实”和“轻率粗俗的风格”两大问题，因此他在译文中特意避免了这些缺陷，且对苏轼生平与地位的介绍有事实支撑，行文也较为严谨。然而，包腊的译文在忠实性方面仍有不足，尤其是对原文中的典故与隐喻，包腊常以通俗表达替代，导致部分文化内涵的流失。

包腊对苏轼晚年遭遇的评价是：“他的控诉与哀叹，尽管运用了夸张修辞，并夹杂着隐晦的讽刺与对不公的情绪，却可能是真诚的。这些言辞表达了他对朝廷生活的怀念以及对皇帝的深切依恋。”包腊进一步指出，在欧洲历史，尤其是英国历史中，有类似的请愿书。这些请愿书措辞更为卑微，通常由被皇室放逐的朝臣撰写，恳求返回宫廷。包腊认为，苏轼的奏折在语调与内容上，与都铎王朝时期被流放的重要人物，如罗利爵士与埃塞克斯伯爵的请愿书极为相似。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1552/1554 – 1618）是都铎与斯图亚特早期英国的重要人物，集探险家、作家、士兵与宫廷官员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深受伊丽莎白一世女

王宠爱。然而，由于与女王侍女秘密结婚而失宠，被囚禁于伦敦塔，最终因叛国罪被处死。他才华横溢，但结局却很悲惨。他也是一位著名诗人、作家，受人拥戴的文化保护者。埃塞克斯伯爵 (Robert Devereux, 2nd Earl of Essex, 1565 – 1601) 是都铎晚期英国的重要政治与军事人物，同样深受伊丽莎白一世宠爱。然而，他因擅自与叛军议和被罢免，随后因发动叛乱失败，被以叛国罪处决。包腊将苏轼的三篇谢表视为请愿书，认为其措辞“夹杂着隐约的讽刺与对不公的情绪”，并指出其风格、语调与内容，与都铎王朝时期被流放者的请愿书极为相似。这一比较不仅揭示了苏轼谢表的情感深度，也为东西方流放文学提供了有趣的比较视角。

三、包腊英译东坡诗

包腊英译的两首东坡诗，分别是《纵笔》和《广州蒲涧寺》，除此外还提及数行诗句。包腊自道文中提及的两首诗内容分别是：“一首是流亡的讽刺诗，据说曾激怒了一位国务大臣，这导致了诗人的第二次流放；另一首是描写他最喜欢的寺院的诗，该寺院以“蒲涧”为名，他曾希望用这里的水供应广州。”包腊在其文注释中提及，“许多居民从 100 英里外的香港获取水源。”在提及广州蒲涧寺中的泉水时，包腊还附有如是评论：“在八百年前，广州的供水问题就已经成为一篇详尽的论文和奏折的主题，这再次证明了当时中国文明的先进发展的程度。广州至今仍在用这股稀少的泉水，但它是由苦力用水桶日复一日地费力运进城市的，既没有水渠，也没有水库。广州街头随处可见‘好茶，用山泉水泡制’的招牌，可见人们对山泉水纯净度的推崇。”

苏轼《纵笔》原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导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曾枣庄、舒大刚, 2021, p.795) 包腊的英译文为“Gray-haired, deserted, wandering wretch, // Whom every frosty wind has blown, // Ask but a couch of cane to stretch // Thy pain-racked limbs on; sick, alone // Within a tiny hut, what time // The passer-by will bid thee sleep! // And the good fathers, as they keep // The morning watch, will lightly strike the chime.”

(Bowra, 1872, p.36) 包腊认为，“很难理解这首诗为何会特别令人恼火，除非其中暗指道士们敷衍了事地守夜，讽刺地希望他们不要敲响那令人乏味的钟声，并说夜已深了，不要打扰不幸的流亡者，这些像是对王座边上那些懒散好闲、自私自利的臣僚们的尖刻讽刺。”

(Bowra, 1872, p.36) 至于其他部分内容，则与莎士比亚诗句中文字游戏几乎完全相似。此处提及的莎士比亚的诗作，来自其诗集《热情的朝圣者》(*The Passionate Pilgrim*) 中的第十四首。Good-night, good rest! Ah, neither be my share: // She bade good-night that kept my rest away; // And daffed me to a cabin hanged with care, // To descant on the doubts of my delay. // “Farewell,” quoth She, “and come again tomorrow:” // Farewell I could not, for I supped with sorrow. (Shakespeare, 1954, pp.1132-1133) 莎士比亚《热情的朝圣者》第十四首诗表达了深沉的失落与爱而不得的情感。诗中的“Good-night, good rest!”(晚安, 安眠)与“Farewell”

(告别)形成了强烈的反讽对比,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前两行展现了诗人无法安眠的痛苦:他与爱人道别后便失去了平静。第三、四行通过“cabin hanged with care”(挂满忧虑的小屋)与“descant on the doubts”(对迟疑进行冗长的思考)表现了他因分离而产生的忧

虑与不安。最后两行“Farewell I could not, for I supped with sorrow”（我无法告别，因为我与悲伤同席而坐）则突出了诗人内心的悲伤难以排解。他既无法真正道别，也无法摆脱悲伤，形成了痛苦的情感循环。东坡诗句“小阁藤床寄病容”可能让包腊直接联系到了“cabin hanged with care”一句。

莎士比亚这首诗与苏东坡的《纵笔》在情感表达上虽有所差异，但都展现了内心的孤寂与痛苦体验。《纵笔》一诗，是苏东坡被流放至岭南后，在一个不眠之夜写下的诗篇，抒发了他在病痛与孤寂中的复杂情绪。莎翁的整首诗以简洁的语言表现了离别的苦楚，情感深沉，展现了莎士比亚诗作中典型的情感复杂性与抒情之美。我们可以做一些简要比较如下：（1）莎士比亚的诗主要描绘了因爱而不得的痛苦，诗人因情感创伤而彻夜难眠，深陷哀伤与思念之中；而苏东坡的《纵笔》则以更为平淡的笔触，刻画了贬谪中的孤寂与身心俱疲，他寄身小阁，藤床安置病躯，在苦难中保持一份豁达的超然心境。（2）莎士比亚通过“Good-night, good rest!”与“sup with sorrow”两句的情感对比，运用反讽和情绪冲突来凸显内心的痛苦；而苏东坡则通过“春睡美”和“五更钟”等意象，营造出宁静清寂的氛围，隐约地表达内心的无奈。（3）在意象与修辞上，莎士比亚用“cabin hanged with care”（挂满忧虑的小屋）等比喻性意象，直观呈现内心的折磨，而苏东坡则以“藤床”“霜风”“五更钟”等贴近日常生活的意象，呈现出更为自然和禅意的表达。（4）在情感深度与哲思方面，莎士比亚的诗更偏向强烈的情感冲突与悲剧性刻画，而苏东坡则在苦难中流露出平静豁达的心境，即便身处流放与病痛之中，依然在自省与自然中寻找超脱之意。总体而言，两者都展现了孤寂与痛苦的主题，但莎士比亚的表达更具情绪冲突与戏剧性，而苏东坡则以更为平静和禅意的方式呈现生命的苦难与心灵的释然。两首诗的情感，一是浓烈，一是清淡，或许包腊并不能完全理解东坡的孤寂以及身处困境中的超然，不能理解这种独特的中国审美体验。

第二首英译东坡诗来自苏轼原诗《广州蒲涧寺》，“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薙卜祖师禅。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曾枣庄、舒大刚，2021，p.685）包腊的英译文如是，“AT THE PU-CHIEN MOASTEBY, WHITE-CLOUD HILLS. I will not have a monk to be my guide, // But, lonely, in yon drooping cloud, explore // Each mountain fastness whence the rivulets slide // The precipice and its thousand trees of yore; // Or where the cataract leaps a hundred feet // To seething pools, with spray in heaven-tinged shower; // Here in the old days grew the rushes sweet // About the hermit's cell, and here the Champak flowers // Heard the first doctrine of the founder-saint: // But now the flowers wear a smile as faint // As who should say, "we mock the King, Ch'in-shih // Who hither sent to learn of immortality!" (Bowra, 1872, p.36)

包腊对苏轼《广州蒲涧寺》的英译在整体意境再现上颇具文学性。他通过“drooping cloud”（低垂的云）、“the precipice and its thousand trees”（千棵古木耸立于峭壁旁）、“the cataract leaps a hundred feet”（瀑布飞泻百尺）等描写，较为忠实地传达了原诗所描绘的自然壮美。然而，在植物意象方面，他将“薙卜”翻译为“Champak flower”，并引用雪莱《印度小夜曲》（The Indian Serenade）一诗的诗句，以增强诗歌的抒情性。包腊所引雪莱诗句为，“The Champak odours fall / On the dark, the silent stream, / Like sweet thoughts in a

dream”（“印度黄兰的香气，落在昏暗、寂静的溪流上，像梦中甜美的思绪”）（Shelley, 1880, pp.10-12）¹通过细腻的描写，传达了梦幻般的宁静与美丽。在此，包腊通过“Champak flower”来呼应这种芬芳与宁静的意境，虽然从诗意的层面上增强了表达的抒情性，但从文化背景来看，薝卜是佛教文化中的常见供花，与诗歌中“祖师禅”的意象息息相关。因而，包腊的译法虽然优美，却可能使这一文化内涵有所流失。此外，他对“笑道秦皇欲学仙”的翻译，将“笑”表达为“a smile as faint”（一抹微笑），虽保留了诗歌的轻蔑情感，但未能充分展现原诗中更强烈的讽刺意味。整体而言，包腊的翻译在自然意象与文学表达上较为出色，但在文化隐喻的传达上仍稍显不足。

包腊夹在文段中由他意译的一首东坡诗，笔者考索无功，未知具体是哪一首。包腊提到，“在他（苏轼）第一次到达惠州的那天所写的一首诗中，他用不同的措辞宣称‘心灵是自己的地方’（the mind is its own place），沉醉于常见而神秘的幻想，认为自己曾经见过这个地方。”这段话反映了苏轼在面对新环境时内心的复杂情感，他通过诗歌表达了心灵独立与对自我认知的探索。这种感受在苏轼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自注：岭南万户酒。会有幽人客寓公。”

诗句“仿佛曾游岂梦中”，包腊的英译文有提及相似的意思。包腊英译苏轼诗后续还有：“Moreover, something is or seems, // That touches me with mystic gleams // Like glimpses of forgotten dreams”。这段英译文笔者返译为：“而且，某种东西似乎是存在的或已显现，// 以神秘的光辉触动着我，// 如那已忘却的梦境之微光。”在这段诗句中，“mystic gleams”（神秘的光辉）和“forgotten dreams”（已忘却的梦境）构成了一种梦境般的意象，暗示着诗人对某种模糊、神秘的现实的感知。

该诗还有后续数句，“But, for the unquiet heart and brain, // A use in measured language lies; // The sad mechanic exercise, // Like dull narcotics, numbing pain.”笔者返译如是，“然而，对于不安宁的心灵和头脑，// 用适度的语言，自有其用处；// 这种悲伤的机械性锻炼，// 像沉闷的麻醉剂一样，麻痹着疼痛。”同样，笔者未能知晓此数句英译诗句的具体出处。这段诗句通过“unquiet heart and brain”（不安宁的心灵和头脑）来描述诗人内心的动荡，而“measured language”（适度的语言）则暗示了一种自我控制与理性的应对方式。与之前的“mystic gleams”相对，这里诗人选择了一种更为理性的方式来对抗内心的痛苦，这也体现了苏轼在面对困境时的一种超然和旷达的态度。“Like dull narcotics, numbing pain”（像沉闷的麻醉剂一样，麻痹着疼痛）这一句以药物麻痹的意象，比喻理性思维对情感痛苦的抑制效果。这种表达间接展现了一种情感的压抑与理性自我防御的姿态，也可解读为诗人内心深

¹ 雪莱的原诗全文为：“The Indian Serenade, By Percy Bysshe Shelley, I arise from dreams of thee // In the first sweet sleep of night, // When the winds are breathing low, // And the stars are shining bright: // I arise from dreams of thee, // And a spirit in my feet // Hath led me—who knows how? // To thy chamber window, Sweet! The wandering airs they faint // On the dark, the silent stream— // The Champak odours fail // Like sweet thoughts in a dream; // The Nightingale’s complaint, // It dies upon her heart;— // As I must on thine, // Oh, beloved as thou art! Oh lift me from the grass! // I die! I faint! I fail! // Let thy love in kisses rain // On my lips and eyelids pale. // My cheek is cold and white, alas! // My heart beats loud and fast;— // Oh! press it to thine own again, // Where it will break at last.”

处的挣扎与自我调适。或许，诗人正是借助语言的节制与理性的力量，与内心的痛楚对抗，从而实现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总体而言，通过对包腊译文的剖析，可以看出苏轼诗歌中“心灵是自己的地方”与“mystic gleams”等意象在跨文化译介中的独特呈现。包腊不仅忠实于诗歌的语言形式，更深入传达了其中蕴含的哲思与情感起伏，在文化层面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再创造。这些译文既保留了原诗的神秘与深邃，又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意象相互映照，展现了诗人在面对人生困境时复杂且深沉的内心世界。

四、包腊对苏轼的公正评价和定位

包腊对苏轼的评价较此前郭实腊的描述更加全面且深入。他不仅强调了苏轼在文学成就上的卓越地位，更着重展现了苏轼丰富而复杂的人格魅力与思想内涵。郭实腊在其 1842 年的文章中曾高度评价苏轼的政治品格：“传记作者对他的赞美是实至名归的；他确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政治人物……他的精神非常坚韧，能够忍受许多挫折而丝毫不感到沮丧，并且像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一样坚定地承受着荣誉和耻辱。”（A Correspondent, 1842, p.141）然而，这种将苏轼概括为“老练的政治家”的评价，显然过于片面，忽略了苏轼仕途屡遭贬谪、政治生涯极不顺遂的历史现实，也未能充分展现他在逆境中所体现的思想超越性与文化贡献。对于苏东坡的公平且全面的评价，直到 1872 年包腊的文章中才得以真正完成。

相比之下，包腊在 1872 年的文章中对苏轼的评价则更为全面、深入且符合史实。他在文章的开篇便指出，“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诗人、散文家和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包腊进一步剖析苏轼的人格特质，强调他在遭遇贬谪时所展现的乐观旷达精神。他指出，无论被流放至何地，苏轼都能迅速融入当地生活，与普通百姓建立真挚的情感联系。他喜欢与农民交往，聆听他们讲述乡村传统与地方风俗，仿佛他并非被流放至此，而是自愿沉浸于这片土地的文化记忆之中。这种超然自适的心态，使苏轼在政治失意中依然保持了人格的完整性。包腊因而指出，苏东坡除了拥有种种无可置疑的才能外，还是一位具有许多可亲可爱品质的人。

包腊通过苏轼的三篇谢表和几首诗歌，串联起其在岭南的流放经历，并借此刻画苏轼在逆境中的精神风貌。在译出三篇谢表后，包腊将苏轼比作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两位被流放的文人政治家——沃尔特·罗利和埃塞克斯伯爵，试图通过西方历史人物的遭遇来帮助西方读者理解苏轼复杂的政治与文学身份。然而，在介绍完苏轼的生平之后，他特别强调道：“对中国人而言，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被放逐的政治家，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为进一步佐证这一观点，他随即翻译了苏轼的几首诗作，以展示其卓越的文学才华与诗歌成就。

在包腊的笔下，苏轼不仅是卓越的诗人，也是一位超越政治身份的思想者和文化巨匠。为佐证苏轼的文学成就，他大胆地将苏轼的诗歌与莎士比亚和雪莱进行对比。尽管这种跨文化比较在文学传统和风格上存在差异，略显牵强，但其用意在于向西方受众强调苏轼诗歌的哲理深度与情感力量。这种跨文化的联想，在今天看来可能会引来争议，但在当时确实富有创意，也是包腊以用西方文学经典诠释苏轼艺术高度的尝试。这种比较方式无疑也推动了西

方汉学界对苏轼诗歌成就的更广泛关注。

包腊还强调，苏轼之所以具备了被视为“圣贤”特质，不仅因为他的文学造诣，更因为他在面对苦难与人生挫折时所展现的旷达与自我超越。他能够在逆境中保持豁达的心态，这种精神特质源于他对儒释道思想的深刻领悟。这种能在艰难境遇中保持内心平衡的品质，正是他被称为“圣贤”的原因之一。他不仅在诗歌与散文中表达哲理性的思考，还在医学领域有所建树。他与沈括合著的《苏沈良方》探讨了药物的功效，显示出他在实用性学术上的造诣。然而，包腊在文章中也出现了一个误解，即他认为苏轼曾阐释了《道德经》，并主张佛道同源。事实上，苏轼虽有《易传》与“以儒解庄”的相关论述，但并无专门注解阐释《道德经》的著作。包腊应该是将苏辙的名著《道德经解》错误地归于苏轼名下了。

简言之，包腊对苏轼的评价在西方汉学界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他不仅纠正了郭实腊“老练政治家”的片面定位，更通过对苏轼诗文、人格与学术成就的多角度剖析，呈现了一位兼具文学才华、哲理思维与人格魅力的文化巨匠形象。尽管在个别细节上存在误读，但包腊的整体论述无疑深化了西方世界对苏轼的理解，成功展示了苏轼作为“诗人”“圣贤”“学者”三重身份的独特文化价值。苏轼之所以能被视为圣贤，不仅因为其文学高度，更在于他面对逆境时的旷达情怀与对生命哲理的深刻洞察，这种精神影响力跨越了时空与文化，至今仍然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值得一提的是，在包腊所处的同一时期，西方学界也曾有其他学者将苏轼称为“哲学家”。1853年1月，《弗雷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其中提到苏轼时写道：“我们的诗人和哲学家在赞美茶方面也不逊色于他人。”这一称呼显然不仅限于苏轼的文学成就，也暗示了其作品中蕴含的哲理思考。到了1879年，欧德理在《中国瓷器传奇》一文中，更明确地称苏轼为“The philosopher Su (Tung-po)”（哲学家苏东坡），主要依据是《赤壁赋》中展现出的深刻哲理与思辨精神。欧德理认为，苏轼的诗意情感深受佛教哲学影响，体现出一种近乎“虚无主义泛神论者和享乐主义哲人”（a nihilistic pantheist and an Epicurean philosopher）的特质。这种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并揭示了苏轼作品中超脱世俗、体悟生死的哲思，但将其归类为“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哲人”的说法，实则并未充分考虑苏轼思想的丰富性与其儒释道融合的哲学观，因而显得有些牵强附会，缺乏扎实依据。

五、总结

自1842年郭实腊发表关于《苏东坡全集》的评论文章以来，苏东坡的诗文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郭实腊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尤其是在政商和文化领域。他的文章一度成为众多“中国通”学者的必读参考文献，直接影响了这些学者的职业发展轨迹。事实上，近代西方人在华的“中国通”身份，往往是通往外交官职的重要途径。然而，这些“中国通”学者（如郭实腊、德庇时、卫三畏）的研究在今天看来学术基础薄弱，甚至带有明显的偏见，但在当时，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极度陌生，他们的作品一度填补了这一认知空白。然而，西方世界对苏东坡的历史定位与较为全面且公正的评价，直至1872年包腊的文章《苏东坡》才得以真正确立。

包腊作为后起之秀，代表了新一代学者，尝试以更加客观的立场研究中国文化。他在

1872年发表的《苏东坡》一文，即批评了郭实腊对苏东坡的片面解读。包腊不仅将东坡视作政治人物、诗人和文人，更强调了东坡作为超越政治身份的思想者和文化巨匠。他呈现了东坡可亲可爱的一面，并指出东坡兼具学者与圣贤的可贵特质，体现了一种更加全面且深刻的文化理解。这种更为公允的解读，标志着西方世界对东坡认知的进一步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早期“中国通”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

包腊的《苏东坡》一文主要依赖于《广东通志》中的资料，而随后的岭南汉学家，如朱尔典 (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 的《苏东坡在海南》(1883) 与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的《古文选珍》(1884) 也译出了多篇东坡诗文 (Jordan, 1883, pp.31-41; Giles, 1884, pp.184-207)。通过多角度的翻译与研究，这些学者推动了东坡诗文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理解。东坡诗文的译介和传播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延续，更是文化、历史与地域因素交织的结果。岭南的对外开放背景、中西文化交流的需求，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共同推动了东坡作品的翻译与传播，最终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此一过程不仅为东坡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拓宽了我们理解岭南文化与世界文学互动的空间。

基金项目：本文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东坡文化研究）课题“东坡在英语世界的译介（1872年前）”[HNSK (ZDZX) 24-21]的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Dadui Yao ^{ID} <https://orcid.org/0000-0001-5366-6170>

References

- A Correspondent [Charles Gützlaff] (1842). “Notices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Sú Tungpo”. *The Chinese Repository* (03): 132-141.
- Bowra, E. C. (1872). “Su Tung-p’o”. *The China Review* (01): 32-37.
- Giles, Herbert Allen (1884).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Self-published by the author).
- Jordan, J. N. (1883). “Su Tung-po in Hainan”. *China Review* (01): 31-41.
- Shakespeare, William (1954).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Venus and Adonis, The Passionate Pilgrim*. E. P. Dutton & Company.
- Shelley, Percy Bysshe (1880). *The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in Verse and Prose* (Vol.4). Edited by Harry Buxton Forman. Reeves and Turner.
- 徐华 (2023) : 《苏轼文学作品的英译与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Xu Hua (2023).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u Shi’s Literary Works*.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姚达兑 (2025) : “近代英语文献中的苏东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03) : 67-76。
- [Yao Dadui (2025). “Su Dongpo in Modern English-Language Documents.”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03): 67–76. DOI: [https://doi.org/1672-0962\(2025\)03-0067-10](https://doi.org/1672-0962(2025)03-0067-10)]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 (2021) : 《苏东坡全集》。中华书局。

[Zeng Zaozhuang, Shu Dagang (Eds.) (2021). *Complete Works of Su Dongpo*. Zhonghua Book Company.]